

全球政治經濟

—掌握國際經濟秩序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作者 羅伯特·吉爾平 Robert Gilpin

譯者 陳怡仲、張晉闡、許孝慈

儘管探討經濟全球化的書籍早已汗牛充棟，
吉爾平淵博、犀利的觀察視野，
仍深刻地指出各國政策和國內經濟，
在未來仍左右著全球經濟事務的平衡與發展。

閱讀本書不僅讓您跳脫「全球化論述」的泥沼，
更能讓您在大師的引領下，
建構宏觀、全面的全球政經視野。

全球政治經濟

——掌握國際經濟秩序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著 —— 羅伯特·吉爾平 (Robert Gilpin)
譯 —— 陳怡仲 張晉闇 許孝慈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全球政治經濟：掌握國際經濟秩序／羅伯特·吉爾平（Robert Gilpin）著；陳怡仲、張晉闡、許孝慈譯 -- 初版 -- 台北縣：桂冠，2004
[民 93]

面：公分 -

譯自：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參考書目：附

ISBN 957-730-448-6 (平裝)

1. 國際經濟 2. 國際金融 3. 國際政治

552.1

92020703

08608

全球政治經濟：掌握國際經濟秩序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著者——羅伯特·吉爾平（Robert Gilpin）

譯者——陳怡仲、張晉闡、許孝慈

責任編輯——劉逢廷

出版者——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縣 231 新店市中正路 542-3 號 2F

電話——02-22193338 02-23631407

購書專線——02-22190778

傳真——02-22192699~60

郵政劃撥——C104579-2 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廠——海卡印刷廠

裝訂廠——欣盈裝訂公司

初版一刷——2004 年 1 月

網址——www.laureate.com.tw

E-mail——laureate@laureate.com.tw

Copyright © 2001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hinese Copyright © 2004 by Laureate Book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未經授權，不得以影印、電子或語音紀錄等任何方式，重製或翻印

本書若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ISBN 957-730-448-6 定價——新台幣 450 元

原序

自從 1987 年我出版了《國際關係的政治經濟分析》(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一書以來，國際經濟已歷經一些根本的變化。⁽¹⁾這些變化，包括了冷戰的結束和民主資本主義戰勝威權共產主義、資訊經濟或網際網路經濟的興起、及新自由學派市場取向經濟的意識型態（解除管制、私有化、和國家在經濟體中角色的一個縮小）之勝利。通訊、運輸、及資訊科技方面重要的技術進展，已經顯著地提高了國家型經濟體之間的互相依賴。這幾個發展已使得國際經濟有所轉型，同時引領進入了經濟全球化的一個新紀元。

除了有朝向創立一個真正的全球經濟的這些重要腳步之外，自從 1980 年代中期開始，這個世界也見證了經濟區域主義的異常成長，一種與經濟全球化相對的發展動向。⁽²⁾在賈帝許·巴格瓦第 (Jagdish Bhagwati) 所稱的「第二波區域主義」中，⁽³⁾西歐已

* 編者按：本書中譯本已由桂冠於 1994 年出版。

⁽¹⁾ 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²⁾ 在統一的力量及分裂的力量間歷史緊張氣氛，是為 Ian Clark 書中的主題，參見 Ian Clark, *Globalization and Fragmentat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³⁾ 參見 Jagdish Bhagwati and Arvin Panagariya, eds., *The economics of Preferential Trade*

經成為是開路的要角，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和在太平洋亞洲一些較不正式的協定，再加上歐盟（the European Union, EU），已經推動世界朝向區域性的經濟安排。在現實的經濟事務及政治事務的世界之中，一些區域性的發展和其他重要的發展，已伴隨著部份經濟理論的創新，這些創新對於理解國際政治經濟（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PE）而言，是有高度關聯的。這些理論的創新，包括有「新成長理論」、「新經濟地理學」、及「新貿易理論」。⁽⁴⁾把這些新理論結合起來，就我們對國際關係中政治經濟學的理解而言，將建立起一極有意義的貢獻。因此，真實世界的發展及理論的發展二者，已為本書對於全球政治經濟的詮釋做好了準備。

寫作本書的一個重點是，我原本打算將本書視為個人於 1987 年所著之書的第二版。然而，最後我瞭解到前面所說那些政治的變動、經濟的變動和理論的變動，一樣會改變我自己對於國際政治經濟的思考，這又讓我有理由以一本全新的書來處理這個主題。這本書應該被視為我最近的一本書，《全球化資本主義的挑戰

21 世紀的世界經濟》（*The Challenge of Global Capitalism: The World Economy in the 21st century*）⁽⁵⁾所作的補充。⁽⁵⁾該書主要是對後冷戰時期國際經濟作一分析及討論，而現在的這本書，是較具理論性的且較直接關注於國際政治經濟學（IPE）的。這兩本書重疊部分並不會太多，而且主要是限縮在幾個處理政策領域的章節而已，像是貿易和貨幣。

⁽⁴⁾ Agreements (Washington, D. C.: AEI Press, 1996), 2.

⁽⁴⁾ 儘管在我 1987 年的那本書中已討論過新貿易理論或戰略性貿易理論（可見註 1 之書），但是我當時並沒有思考的很周詳，而且我也沒有想到說可把這個理論與新成長理論和經濟地理理論結合起來討論。

^{*} 編者按：本書中譯本已由桂冠於 2004 年出版。

⁽⁵⁾ *The Challenge of Global Capitalism: The World Economy in the 21st centu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在準備本書時，我從許多機構和許多人那裏獲得極大的支持和協助。我最要感謝的是伍德·威爾森學校（Woodrow Wilson School）、普林斯頓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Princeton University），他們在財務上及其他方面的支持。以及主要由全球夥伴日本基金中心（Japan Foundation Center for Global Partnership）所贊助的亞伯研究獎助計畫（Abe Fellowship Program），也曾慷慨支持我的研究工作。我還要感謝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 College）的約翰·狄奇國際互信中心（John Sloan Dicke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以及該中心的主任麥克·馬斯坦杜諾（Michael Mastanduno），在 1998 年冬天的那個學期提供我一個智識上的家。特別要感謝的是瓊安尼·高瓦（Joanne Gowa）、羅伯特·基奧恩（Robert Keohane）、阿圖·科里（Atul Kohli）等人，他們對初期的草稿提供了許多傑出的評論。由狄奇中心（Dickey Center）、麻省理工學院政治系（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of MIT）、佛蒙特大學政治系（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the University of Vermont）、中歐大學（布達佩斯）（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Budapest)）、波士頓學院政治系（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Boston College）所贊助的研究講座上，讓我能夠接受到對於我一些觀念的重要批判。也特別要感謝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的查理斯·麥爾斯（Charles Myers），他相當有耐心地看待稿子的延遲，也耐心地和筆者共同處理其他的事情，一直到他護送本書順利自出版社發出，我同時也要感謝本書的編輯瓊安·杭特（Joan Hunter）的專業和認真。最後，也是很重要的，特別感謝我的妻子，珍（Jean）。她在本書的勘誤、抄寫、及使人更清晰易懂等工作上的付出，全心盡意，她和我共同大聲朗誦本書內文的次數，就遠超過我所能記憶的。此種嘗試對於婚姻生活而言或許是種負擔，但願能增益本書的質量。

譯序

就在本書《全球政治經濟：掌握國際經濟秩序》譯稿初步完成之際，台海兩岸之間的政治經濟情勢也正經歷一場微妙而複雜的變化。一方面，執政的民進黨政府，為了確保台灣作為一個主權獨立國家，塑造在國際政治體系中的主體性（當然也為了勝選考量），接連發起了台灣正名運動與推出公投制新憲的藥方，除了逐步拉高政治層次、主導總統選戰議題外，也成功地將台灣主流民意引導至「反共拒統」的路徑當中；但在另一方面，面對中國強大的經濟磁吸力量，及其所衍生之三通直航問題、產業外移問題、及中國新娘大舉登台等經濟社會問題，其所彰顯出來之「政治趨獨、經濟趨統」的矛盾，卻在令台灣的執政者顯得左支右绌而只得以拖待變。

政治和經濟，或者應該說是國家和市場之間類似的衝突與矛盾，不但在台海兩岸之間上演，在各國經濟體與跨國公司、已開發國家和低度發展國家、國家和國際組織、乃至於一國內部之政府和社會企業組織之間，同樣也存在著相似或相異的政治經濟矛盾，雖然議題可能因時因地而在衝突程度上或有不同，但衝突矛盾的內在本質及其複雜難解的程度則是不分軒輊。也就是說，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所謂「政經分離」的現象與研究途徑，在戰後已經無法適用，特別是在冷戰結束之後，由於威權共產主義的分崩離析、資訊經濟的興起、及新自由學派之市場取向意

識形態的席捲全球，更令許多問題無法在政治、經濟各自分立的研究論述中得到充分而圓滿的答案。因此，從一九六〇年代開始，歐美部份政治學者與經濟學者，便開始對於國際政治中的經濟因素和全球經濟中的政治問題投予更多的關注，並嘗試結合國際政治學與世界經濟學。新興學科——「國際政治經濟學」(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PE)因此應運而生，並在一九八〇年代取得重要的發展。

作者羅伯特·吉爾平 (Robert Gilpin)，一九三〇年出生於美國佛蒙特州白靈頓，一九五二年畢業於佛蒙特大學，一九五四年取得康乃爾大學碩士學位，一九六〇年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取得博士學位，一九六〇至六一年間則在哈佛大學從事博士後研究，一九六一年起在普林斯敦大學擔任國際關係課程之教職，期間並曾擔任洛克斐勒基金會研究員和美國總統科技經濟顧問團顧問，目前則為美國普林斯敦大學艾森豪公共及國際事務學院之榮譽教授。他不但是國際政治經濟學的開山祖師之一，更是將國際政治經濟學繼續往前推進的箇中翹楚，其所著述之《國際關係的政治經濟分析》(*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87)一書，除了奠定其在此一領域中的地位外，該書並已成為國際政治經濟學界的重要地標。吉爾平在此一領域的相關著作還包括：《美國實力和跨國公司》(*U.S. 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1975)、《世界政治中的戰爭與變遷》(*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1981)、《貿易、投資與科技政策》(*Trade, Investment and Technology Policy*, 1982)、及《全球資本主義的挑戰：二十一世紀的世界經濟》(*The Challenge of Global Capitalism: The World Economy in the 21st Century*, 2000)等。

在吉爾平的構想當中，本書原本是一九八七年《國際關係的政治經濟分析》一書的再版，未料在此後的十四年間，全球的政治經濟情勢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其變化之大，足以令作者本人的想法產生極大的轉折。因此，我們可將本書視為是吉爾平在全新的政經情勢下所寫的一本不折不扣的「新書」，或視其為二〇〇〇年《全球資本主義的挑戰：二十

一世紀的世界經濟》的補充。

本書焦點首先集中在對於促成世界變遷之各項經濟、政治、與科技等強而有力的因素，所進行的各方面探討。其次，雖然有關經濟全球化議題的討論已經汗牛充棟，但吉爾平依舊給予特殊的關注，並試圖在坊間對經濟全球化的本質、範圍、及其重要性產生誇大不實的宣傳或誤解時，給予適當的說明與澄清。最後，吉爾平依然認為各國政策和國內經濟對於全球經濟事務具有關鍵性的決定力量，至於經濟區域主義、跨國公司、及金融變動的重要性，小為本書重點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吉爾平在本書中整合政治學和經濟學的分析方法，運用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產業組織理論、內生性成長理論（*endogenous growth theory*），並旁徵博引政治學、歷史學、及其他學科的概念，以充實讀者對於嶄新國際經濟秩序的理解，雖然因此增加了本書翻譯的困難度，但卻相對提高了本書的可讀性與價值感。

全書共分十五章九十一節，從世界經濟的變遷開始談起，繼之討論政治經濟學的本質、新古典經濟學的概念、及介紹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相關研究，並透過作者對各國經濟體系、國際貿易體系、國際貨幣體系、國際金融體系、國家機器、跨國公司、及區域整合的研究與探討，勾勒出國際經濟秩序的最新輪廓。由於本書內容非常充實而多元，為避免耽誤國內讀者閱讀本書中文版之時效性，全書之翻譯係由三人共同分工承擔，其中，前言、第一章至第五章由許孝慈負責，第六章至第九章由陳怡仲翻譯，至於第十章至第十五章則由張晉閣進行譯介的工作。譯者能力所限，譯文中如有不妥之處，煩請讀者不吝批評指正。

陳怡仲、張晉閣、許孝慈等 於二〇〇三年十一月

目 錄

原 序	i
譯 序	v
第一章 新全球經濟秩序	1
第二章 政治經濟學的本質	29
第三章 經濟體之新古典學派的概念	57
第四章 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	97
第五章 新經濟理論	127
第六章 新經濟理論的政治意義	159
第七章 各國的政治經濟體系	183
第八章 貿易體系	239
第九章 國際貨幣體系	283
第十章 國際金融體系	313
第十一章 國家與多國企業	337
第十二章 國家與經濟發展	373
第十三章 區域整合的政治經濟學	419
第十四章 全球經濟中的民族國家	445
第十五章 全球經濟的管理	463
參考文獻	497

第一章

新全球經濟秩序

本書是在分析世界經濟的全球化，以及世界經濟的全球化對於國際政治經濟學之實質的與被指稱的蘊涵。自冷戰結束後，全球化已成為國際經濟事務最為顯著的特色，再延昇思考，對政治事務而言亦是如此。然而，我將在本書中指出，儘管在二十一世紀初，全球化已成為國際經濟的關鍵特徵，但不管在公眾的討論或專業的討論之中，經濟全球化的內容和意義，都已被過度誇大和誤解；事實上，全球化的影響性（消極的或積極的），並不像許多當代觀察家所認為的那般廣泛，或是那般的勢如破竹。現下依然是這樣的一個世界，即國家政策和國內經濟依然是經濟事務之首要決定因素。全球化以及與時俱增的經濟上的交互關聯性，在國家型經濟體之間是越來越重要；如同專家國際事務機構的文森·凱伯（Vincent Cable）曾經指出，在二次戰後的時代中主要的經濟成就，即是復原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就已存在的國際經濟整合之程度。⁽¹⁾

在我 1987 年的書中，缺少了一個適當的國內因素之面向。在該書對國際經濟的分析中，僅將國內經濟發展列為次重要的。在

⁽¹⁾ 參見文森·凱伯，“The Diminished Nation-State: A Study in the Loss of Economic Power.” In *What Future for thee State?* *Daedalus* 124, no. 2 (spring 1995) : 24.

4

某種程度上，這個疏忽是肇因於我期望協助發展一個具自主性的，自成一體的國際政治經濟學（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現在的這本書，是企圖透過關注於一個我稱之為「政治經濟學的國家體系」（national system of political economy），以及關注它們對於國內的經濟事務和國際的經濟事務二者之意義，來克服前書中令人遺憾的弱點。當各個國家型經濟體變得越來越朝向整合時，各個國家型經濟體之間的根本差異，也就越來越大了。在我 1987 年的書中，還存有幾個主要的限制，包括對於跨國公司（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經濟發展、和經濟區域主義的處理；儘管，當時我曾討論到前述三者的重要主題，但是從其後續的發展觀點來看，卻需要有更多的說明才是。

1980 年代中期，在國際經濟事務上有一個新革命，即跨國公司（MNCs）與外國直接投資，幾乎是在世界經濟的每個角落都開始產生深切的影響。⁴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因為國際貿易的增長而改變了國際經濟事務。其次，在 1980 年代，因跨國公司的海外擴展而令各個國家型經濟體的整合變得越來越完全。此外，「跨國的」一詞，幾已等義為美國公司的擴展；而於 1980 年代，其他國家的公司也加入跨國公司的行列。更重要的是，跨國公司引領了服務與製造這二方面的國際化路線。

我在 1987 年的書中，對經濟發展所進行的討論，如今已完全過時；當時學界主要關注的是類馬克思主義者的依賴理論（quasi-Marxist dependence theory）和已發展世界與較低度發展世界的嚴重分裂。而現今就經濟發展所進行的討論，則集中於在發展的過程中，國家和市場的適當角色。1987 年該書的結論，已指出經濟的區域主義（economic regionalism）是未來的趨勢。現今，

* 譯註：“multinational firms”，此處譯為「跨國公司」；近來亦有「多國籍公司」之譯法。

經濟的區域主義已達到高潮，並對國際經濟產生顯著的影響。同時，自 1980 年代中期以來的金融發展，亦已大大地增加了世界經濟的整合，這也是我們應該要加以注意的。本書也提問到這樣的問題，即在全球經濟的組成和運作中，市場的重要性是持續增加的，而此是否就意指著如本書所定義的民族國家終結與國際政治經濟之終結？我並不認為如此，相信對那些熟悉我過去著作的人們而言，這是不會令他們感到意外。

相較於我過去的著作而言，本書的首要目的，是要結合對真實世界描述和最近的理論發展，來對國際政治經濟學有更全面性的理解。而我 1987 年那本兼容並蓄的書，是要展現我所認為的國際政治經濟學（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PE）的三個主要觀點：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與國族主義（nationalism）；現本書是採取一個更嚴謹的現實主義者的進路，或以國家為中心的進路（state-centric approach）來分析國際經濟。迥異於許多當代有關全球經濟的作品，我相信民族國家（nation-state）在國內的經濟事務或國際的經濟事務二方面，依然還是主要的行動者。基於經濟的分析和政治的分析對於瞭解國際經濟運作有其必要性，本書亦將統整這些學界研究中的模型。5

世界經濟的變動

本書成書很大的動機，是因為自 1987 年以來國際經濟已有許多重大變動。當然，最重要的變動，即是歷經了冷戰的結束以及蘇聯對美國及其歐洲的盟友和日本盟友威脅的結束。在二十世紀的後半世紀，冷戰以及因冷戰而形成同盟的結構，提供了供世界經濟得以運作的架構。美國與其主要盟友為維持政治及安全合作之需，大體而言，都會將潛在的經濟衝突列為次要。安全利益及

盟邦的凝聚之著重，成為了政治的膠著劑，亦因此促使世界經濟得以聚合起來，並能以經濟議題來促使各國家間的重要差異得以相互妥協。而隨著冷戰的結束，美國的領導地位，以及在資本主義世界的權力，使得各種經濟合作開始出現。同時，市場取向世界之發展，已遠遠超越了以往共產主義國家與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也促使它們更加積極去參與市場體系；這已經可由世界貿易組織（WTO）中較低度發展國家（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LCDs）所採取的許多主動性角色，來獲得例證。當這樣的發展成為被預期時，管理全球經濟體系的工作，遂變成令人怯步。

經濟全球化，現已被指稱為是在貿易、金融、和跨國公司的國外直接投資等等這些關鍵的發展。⁽²⁾國際貿易的迅速成長，遠遠超過全球經濟的產出。此外商業交易（物品）、服務性質之貿易（銀行、資訊等等）的重大擴展，亦明顯地增長。隨著運輸費用的降低，使得越來越多的物晶變成是「可交易的」（tradeables）。由於世界貿易的巨幅擴展，國際間的競爭也變得越來越大。儘管，消費者與各國的出口商，皆可從開放機會的增加中，獲得他自己國家的利益，但許多商人也發現到，他們可以從與其他國家公司的競爭中，來提升他們自己的效率。在 1980 年代到 1990 年代之間，貿易競爭已成為東亞地區一群數目仍在增加的工業化經濟體之間所熱衷的，同時它們係採取以出口導向取代進口依賴的成長策略。儘管如此，對大部份的美國的公司而言，其主要的競爭對手還是那些其他的美國公司。

在全球貿易的擴張上，現在已經有許多成就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透過許多回合成功的貿易談判，致使貿易壁壘已顯著地消滅。在二十世紀的後半個世紀中，美國與其他工業國家的

⁽²⁾ 關於對全球化的強烈攻擊和其被指控的罪惡，可參見 Richard Falk, *Predatory Globalization* 一書 (Oxford: Polity Press, 1999)。

平均關稅已從約 40%降至僅約 6%，一些服務性質貿易的稅率就更低了。⁽³⁾此外，從 1970 年代末期起，解除管制與私有化，也促使各國經濟體對於進口更加的開放了。通訊技術與運輸技術的發展，降低了成本且顯著地促進了貿易的擴張。經由經濟的變動與科技的變動，越來越多的商業參與了國際市場。然而，儘管有這些發展，但大部份的貿易行為，還是發生在三大工業化經濟體——美國、西歐、和日本，而其餘極少數的新興市場，才是東亞、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區。大部分的較低度發展地區，除了食物和初級原料的出口之外，都是被排除於國際市場之外的。以沙哈拉沙漠南端的非洲為例，估計僅佔 1990 年代世界貿易總額的百分之一。

自 1970 年代中期起，金融政策的解除管制和新金融工具的出現，像是具衍生性質的新金融工具等，以及通訊技術的進步，對於形成一個相當高整合程度的國際金融體系而言，是有其貢獻的。在 1990 年代，外匯交易的數目（買賣各國貨幣）已達約 1.5 兆美元／日，較 1986 年增加了八倍；相對的，1997 年全年的全球出口（財貨與勞務）總值是為 6.6 兆美元，即為 2500 萬美元／日！其次，在追求較高回收的投資資本，其總額也有劇幅的成長，在 1990 年代中期，共同基金、退休金基金等等，總計共有 20 兆美元，是為 1980 年代總額的十倍。再者，這些巨幅投資的特徵就是會越來越擴大，這是因為有相當大比例的國外投資是靠此來獲取利潤的；也就是說，它們是借用基金的錢來作投資的。最後，衍生而出的或許是重新設計的安全機制，或許是其他財務會計機制，在國際金融上也會扮演其重要的角色，這些估計有 360 兆美元（遠超過整個全球經濟活動的總值），這已對國際金融的複雜性

⁽³⁾ 參見 Gary Burtless, Robert Z. Lawrence, Robert E. Litan, and Robert J. Shapiro, *Globophobia: Confronting Fears about Open Trade*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8), 5-6.

7 和不穩定性，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相當明顯的是，國際金融對全球經濟已有深切的影響性。

相較其他方面而言，這種金融的變革已與各國的經濟有了緊密的關聯，而且提高了發展中國家資金取得的可能性。許多的金融流動，都是短暫性的、具高度變化性的、和投機性的，所以國際金融已成為全球資本主義經濟之中最不穩定的一部份。跨越了國家疆界的金融變革，其所具有的巨大規模的、迅速的、與投機性質之本質，卻也讓這些國家的政府在這些變革中能夠更主動地作出迅速的調整。這些政府也因此可以輕易的誘懲炒作通貨的投機客，如同發生在 1992 年的歐洲金融危機，而且這也是英國放棄加入歐洲匯率交換機制（European Exchange Rate Mechanism）的原因，又如同發生在 1994 年到 1995 年墨西哥披索的懲罰性貶值，還有在 1990 年代末期那具毀滅性的東亞金融危機，也是相同。然而，對某些人而言，金融全球化，亦成為全球資本主義其具活力且具有獲利性的成就之例證，對其他人而言，全球金融體系是「在控制之外的」，但應該有更好的管制才是。總之，國際金融，是「全球化」一詞被加以最適利用的一處。

在 1980 年代後四分之一的時期中，「全球化」一詞被廣泛的運用，且是與跨國公司大規模的國外直接投資（FDI）直接關聯在一起。跨國公司（MNCs）與國外直接投資，在好幾世紀以來，一直是以東印度公司和其他「冒險家式貿易」的形式呈現，在較早的戰後數十年間，絕大部分的國外直接投資，是由美國公司所進行，而且美國僅僅接受來自少數非美國公司很微量的國外直接投資金額。但在 1980 年代，國外直接投資顯著地擴張，且較世界貿易與全球經濟之產出更為快速的增長。在較早的戰後數十年間，日本、西歐、和其他國家，變成主要的投資者，同時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身兼主客二者的經濟體。這些發展所帶來的一個結果是，從已經工業化的國家流向正在工業化的國家之國外直接

投資，每年約有百分之十五的成長。然而，國外直接投資的最大部份是流向那些已經工業化的國家，特別是美國和西歐國家。國外直接投資的累積價值，已達數百億美元。此類投資中，最大的部份是投入於服務業方面，以及自動化與資訊等等高科技的產業。事實上，資訊，其本身已成為是一「可交易性的」，而且這也在國際商務上引發一些像是智慧財產權的保護與服務業的市場進入等等新議題。貿易的增加與金融流動的結合，以及跨國公司與日俱增的重要性，已經明顯令國際經濟進行轉型。⁸

儘管冷戰結束提供了一個真正的全球經濟形成之必要的政治條件，但是經濟的發展、政治的發展與科技的發展業已超前經濟全球化，成為主要的領導力量。運輸方面，新科技已降低運輸的成本，特別是在跨洋航程上，成本已大幅降低，因此也開展了全球貿易系統的可行性。此外，電腦和通訊之進展，亦大幅地帶動了全球金融的流通；這些發展是極端重要的，使得跨國公司可以去追求全球性的經濟策略與運作。時間與空間得以藉由這些科技的改變而壓縮，亦已因此讓國際商務的成本顯著的降低。全球化已經在國際經濟的合作與新經濟政策下產生。在美國的領導下，已經工業化的經濟體與正在工業化的經濟體，皆已採取一連串降低貿易壁壘和投資聯繫的主動作為。在關稅暨貿易總協定下的八個回合的多國貿易談判中，針對貿易自由化的主要論壇，已明確地削減了貿易壁壘。再者，越來越多的談判，亦已促進解除管制與私有化等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這些發展是源於一個持續增長的市場取向之全球經濟。

許多觀察家相信有一個劇烈的變遷正在發生，就是國際經濟從國家主宰的取向，轉向為市場主宰的取向。許多論者指出，人類迅速地朝向一個無政治疆界的世界發展。⁽⁴⁾蘇維埃計畫式經濟

⁽⁴⁾ 市場的重要性及其變革，是約翰·希克斯於 *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 (London: